

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 以2001年立委選舉為例*

王柏耀**

《 本文摘要 》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選民針對經濟情況的評估是否會影響到投票抉擇呢？也就是在台灣選舉中，隨著經濟環境的惡化，選民是否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當選民認為經濟不好時，是否會用選票來懲罰執政黨？透過以下幾方面，本文將探討經濟情況的評估與投票抉擇的關係、歸因理論、經濟投票異質性。研究發現為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調查資料中，選民針對個人與國家經濟情況的評估，不論是回顧或前瞻的經濟評估，皆與投票抉擇之間存有顯著的差異。然而在投票模型中，個人與國家的經濟評估並不是主要影響投票抉擇的因素。在台灣選民的投票考量上，政黨認同、統獨立場仍是主要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主要變數。因此利用歸因理論與樣本篩選，本文發現一群具有經濟投票特質的選民，而他們的投票抉擇則是受到針對國家經濟情況所做的評估影響。不過，在經濟投票異質性的檢驗上，政治信任感與選民針對國家經濟情況之評估，兩者間並不存有交互作用。換言之，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並不受政治信任感的影響。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台灣選民經濟投票行為存有異質性，但是是何種變數影響所致，仍有待後續研究探討之。

關鍵字：經濟投票、異質性、歸因理論、政黨認同、政治信任感

* 本文曾在「2001選舉與民主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並感謝評論人林繼文老師，與陳陸輝老師等提供之寶貴意見，以及「選舉研究」三位匿名審查人之審查意見，作者在此一併感謝，惟本文文責由作者自負。

** 政大政治所碩士。

壹、前言

2001年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在台灣選舉史上可以說是代表了一個新里程碑。它所代表的意義在於第一，選民對新政府執政能力的信心考驗，這是民進黨自總統大選執政以來，面對的第一個全國性大選，也是政黨輪替之後，新執政黨面臨的第一個挑戰。第二，新舊政黨之間的交接，包括宋楚瑜的親民黨、李登輝的台灣團結聯盟興起，從表1立委選舉各政黨的得票記錄，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現今政壇上政黨分合的現象。第三，冷清的選舉，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這次選舉很明顯地不若過去幾次選舉來得激情。在這些現象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環境上，台灣的政經情勢相較於過去產生了很大的轉變。

表1 立委選舉各政黨得票記錄

政黨	席次	得票數	得票率
民進黨	87	3447740	33.5%
國民黨	68	2973060	28.9%
親民黨	46	1917836	18.6%
台聯	13	801560	7.8%
無黨籍	9	851023	8.3%
新黨	1	269620	2.6%
其他*	1	42474	0.4%

* 說明：其他為其他政黨候選人。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屆公職人員選舉資料庫。

在這些轉變中，筆者有興趣的是選民投票行為是否受到影響。許多研究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文獻皆提到政黨認同、議題取向或是候選人評價都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徐火炎，1991；林慧萍，1995；黃秀端，1996）。此外，包括世代、統獨立場、族群意識等台灣特殊政治環境所造就的影響因素，也是學者研究的焦點（劉義周，1996；黃德福，1994；盛杏媛，2001）。然而，選民對經濟情況的評估是否會影響到投票時的抉擇呢？也就是在台灣選舉中，隨著經濟環境的惡化，選民是否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當選民認為經濟表現不好時，是否會用選票來懲罰執政黨？之所以會引伸出這些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總體經濟的惡化程度，已經引起一般民衆的廣泛重視，最明

顯的例子莫過於失業問題，從圖1總體經濟指標，可以發現2001年不論是失業率、經濟成長率或是民間消費的能力，相較於過去台灣的經濟發展都有相當程度的衰退。我們在選前也可以看到在野黨的領袖提出各項挽救經濟的主張，以提醒選民經濟環境的惡化是出自於執政黨的無能、決策過於粗糙，以致於人民的生活變苦了（註一）。換言之，在整體環境的影響下，2001年的立委選舉中，台灣選民是否具備「經濟投票」的行為呢？是本文所要關注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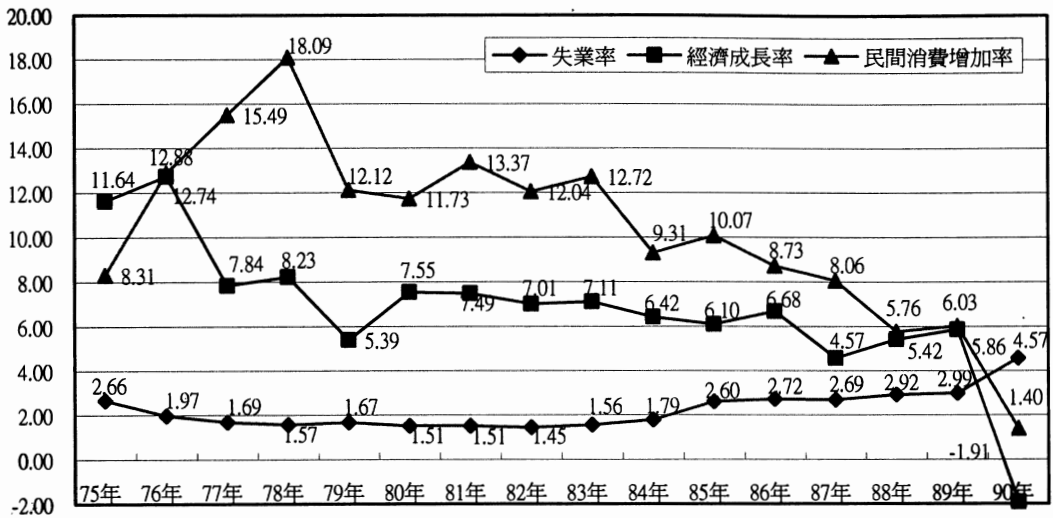


圖1 民國76-90年台灣地區各項經濟指標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經貿統計，經筆者自行整理而成，網址：<http://www.moea.gov.tw/~meco/stat/four/f-1.htm>。

貳、相關文獻回顧

一、經濟投票的理論

根據 Lewis-Beck (1988) 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研究中指出，經濟投票最初步的假設就是：當經濟變壞時，執政黨下台。在這個命題上，完全不帶有前瞻性的意涵。換言之，選民通常是以執政黨過去的表现與行動來作為投票的考量，而非未來的承諾，因此 Lewis-Beck 對於傳統經濟投票理論 (traditional economic voting theory) 所提出的命題為：

當選民肯定（不肯定）過去的經濟表現時，他們便會投票支持（反對）執政黨。（Lewis-Beck, 1988：34）

但是對於這個命題的精確意義，則有若干地方必須進一步地加以釐清，包括：

- 1.何謂經濟標的？是選民個人荷包，還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
- 2.在時間座標上，要注意的是過去的經濟表現還是未來的經濟展望？
- 3.選民如何做成判斷？是直接還是間接？是理性還是感性？

（一）個人經濟評估或是國家整體經濟評估

針對選民所評估的經濟標的，究竟是考量到個人的經濟情況呢？還是國家整體經濟評估呢？Kinder and Kiewiet（1981：129-130）談到，選民的投票行為可能從(1)個人認定自身經濟情況好壞來投票；(2)由個人評估國家整體的經濟表現來做投票抉擇。如果是前項，則稱之為荷包投票（pocketbook voting），其根據個人的生活經驗與感受，來決定要投給誰，如果個人覺得自己或是家庭的經濟情況有改善，便較會支持執政黨，反之，則傾向支持在野黨。至於後項則稱為社會經濟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如果選民認為經濟繁榮時，便會傾向支持執政黨，如果覺得經濟不景氣時，則會唾棄執政黨，改投給在野黨。這是一般學者對荷包投票與社會經濟投票的認知。

至於哪一項對於選民投票抉擇有較大的影響呢？理論上，荷包假設的訴求力似乎較為強烈，因為個人對於自身經濟情況的變化是親身體驗於日常生活中，畢竟大多數選民對於國家事務的印象往往是模糊、抽象的，不若個人經驗來得鮮明，然而實際研究中，卻顯示社會經濟投票的影響力要較荷包投票來得大（黃秀端，1994：101）。Lewis-Beck（1988：42-50）的跨國資料分析中談到「當愈多民衆察覺經濟變壞時，則對政府政策也愈不滿」，在五個國家中，德國與法國分別是民衆對經濟情況不滿比例最低與最高的國家。結果顯示，覺得個人經濟情況很差的選民，投給反對黨的比例，是覺得經濟情況較好的選民中，投給反對黨比例的兩倍。而比較國家整體與個人經濟情況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國家整體經濟情況的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更大。

Kinder and Kiewiet（1981）對於1972至1976年的美國國會與總統選舉研究發現，全國經濟情況的影響要大於個人經濟情況。同時後續的研究也找出個人經濟評估與國家整體經濟評估在國會與總統選舉中，也存在著差異。個人認為最重要的經濟問題為通貨膨脹，而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則是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以多元迴歸的方式，來檢驗國會選舉中，何者的影響較大，結果顯示在三次選舉上，個人經濟評估的變數，對於國會選舉的投票決定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反之，則是社會經濟的評估對於國會選舉的投票決定影響較大。至於在總統選舉的層次上，個人經濟評估對投票決定之影響，同樣不若社會經濟評估的影響來得大。最後，Kinder and Kiewiet 也利用社會經濟評估與對總統候

選人的評估作相關分析，得到政府表現與景氣情況會與候選人評估有正相關的關係存在。因此，結論是社會經濟投票的選民會獎賞做得好的現任者，反之，則是懲罰表現不好的現任者，社會經濟投票者對於政治領導者的要求，並不在於他為選民個人做了什麼事，而是他對整個國家或是未來做了什麼，Kinder 和 Kiewiet 並利用心理因素來分析為何社會經濟評估對於選民的投票決定會有較大的影響，結果發現選民通常將個人所遭遇的經濟問題歸咎在地方景氣問題或是工作環境所致，但對於國家經濟問題則會歸因在政治因素中（Kinder and Kiewiet, 1981：157）。Duch（2001：900-904）針對匈牙利與波蘭1997年的選舉，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所得到的結果，也顯示不論是回顧型或是前瞻型國家經濟評估對於投票傾向的影響，都要大於個人經濟評估的影響，如進一步地將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感與經濟變項做交互作用，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個人對全國經濟的評估，隨著政治知識與政治信任感的提高，對投票決定的影響也隨之增加。

（二）回顧型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或是前瞻型投票（prospective voting）

關於回顧型投票的界定，為選民根據事實，而非幻想來投票，考慮的事項有可能包括重大事件或是經濟表現。因此，回顧型投票取向的選民，注重的是執政黨作了些什麼。就經濟投票的研究而言，對於選民在回顧型投票的界定為選民投票抉擇根據的是經濟表現，而非經濟政策計畫，因此當選民認為經濟情況變差時，便會投票給反對黨，來懲罰執政黨。至於前瞻型投票，選民所根據的是執政黨或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承諾，由於選民對未來的期待心理因素，因此他們會選擇他們所偏好的政見來投票（Lewis-Beck, 1988：39-40）。

我們預期選民對於經濟表現可能是以回顧型方式來評估，也有可能是以前瞻型方式來評估。Downs（1957）提出投票的基本邏輯，從理性抉擇的研究途徑出發，其假設選民均是理性的，並極大化自身利益來作為投票的取向，因此選民會投票給能承諾提供理想社會福利的政黨，透過投票來極大化報償（payoff）。而選民在評估政黨的承諾時，乃是依據政黨現在的表現，以減少在蒐集未來表現資訊所需付出的成本。因此，在理性選民當中，回顧型投票會較前瞻型投票更受偏好，亦即選民的投票抉擇是根據過去與現在的事件，而非未來的承諾來投票。在傳統社會心理學理論中，選民會利用投票來表示對現任政府過去表現信任或是不信任，當選民肯定政府的政策或行動時，便會支持之；反之，當選民希望有不同的表現時，便會反對之。至於在理性抉擇的理論中，理性選民會比較現任者的表現與挑戰者的政綱來決定要投給誰（Fiorina, 1981：164-175）。

在1980年代迄今，Fiorina 提出的回顧型投票，為議題取向投票注入新的內涵，在80年代學界也因此興起一股研究經濟因素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熱潮。後續學者也提出不

同的意見，MacKuen, Erikson 和 Stimson (1992: 597) 認為練達 (sophisticated) 的經濟選民會將關於未來的新資訊整合入個人經濟期望中，認為回顧型評價在總統選舉當中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影響投票抉擇因素，前瞻型評價對於投票影響更甚於回顧型評價。作者利用消費者意見指數 (the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 ICS) 作為經濟情況與評價的中介變數，發現前瞻型評價能夠充分地解釋總統評價時間序列模型。因此，作者認為選民對未來經濟表現的期望會影響到其投票抉擇。

前瞻型經濟評估與回顧型經濟評估也引起學者對兩者之間關係的討論，多數人認同前瞻型評估是奠基在回顧型評估上，包括對過去執政黨的經濟表現，媒體對經濟情況的報導對選民的印象所產生的影響等。Conover, Feldman 和 Knight (1987: 560-566) 在其研究中認為前瞻型經濟評估的形成會受到過去經濟評估的影響，利用訊息形成理論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來界定前瞻型評估的形成，所提出的論點包括前瞻型評估要較回顧型評估更為複雜，需要更多資訊，包括對政府政策實現能力的評估，需要瞭解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等意義。因此，作者們也質疑究竟選民對於回顧型經濟評估，是否具有正確的瞭解與認識。透過固定樣本連續訪問法 (panel study)，利用連續三波電話訪問，Conover 等人企圖探討選民對於未來全國性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評估，對未來國家經濟所形成的前瞻性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以及前瞻型經濟評估形成的過程。結論是約有20-35% 選民對經濟情況存有錯誤的看法，然而隨著連續訪問的進行，認知錯誤的比例有降低的趨勢。前瞻型與回顧型經濟評估之間的關係，兩者間的相關係數並不高，最高僅達0.56的正相關程度。在前瞻型評估的形成過程中，如果選民愈瞭解國家經濟事務愈能正確評估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的動向，如果愈受到個人特質與政黨傾向的影響，則對經濟事務之評估亦愈出現偏誤，並影響到其投票抉擇 (Conover, Feldman and Knight, 1987: 569-576)。

總結對於回顧型與前瞻型投票的討論，我們可以瞭解選民的確會根據執政黨的經濟表現好壞來決定其投票對象。就如同 Downs (1957) 所提，選民會期望從各政黨的經濟表現來做出決定，並透過比較，選民會預期政黨未來的經濟表現，以前瞻型的評估方式來投票，而選民愈瞭解過去與未來經濟情況，愈能符合經濟投票的理論來獎懲執政黨。

(三)選民的認知與情感

就選民的認知層面而言，可以透過理性抉擇的投票理論來解釋，理性抉擇論者從個人理性的假定出發，並推演出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為模式。值得說明的是，理性抉擇論者所談之理性，指的是目標導向的行為，至於該行為—甚至是目標本身—是否合乎道德，則不在考慮之列。更具體的來說，所謂目標導向的行為，即指人會依據偏好來作選

擇。在邏輯上，要將偏好排出順序，至少必須滿足聯結性（connectivity）與遞移性（transitivity）這兩個條件。除此之外，另一個與個人理性相關的概念則是效用（utility）。所謂的效用，即指一個財貨使個人感到滿意的能力。因此，如果一個人在口渴的時候，若給他一杯水，會使他非常受用，則我們便可說這杯水給他的效用很大；假使他並不感到口渴，則這杯水對他而言，便起不了什麼效用（謝復生，2000：143-145）。因此，將理性抉擇應用在選民投票行為時，所強調的是成本收益的計算，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資訊，選民透過資訊的獲得來考量候選人的政策或政綱；以及候選人過去表現，比如對通貨膨脹、失業率或是經濟成長率的評估。投票便是在偏好的候選人之中做出選擇，並且根據期望值效用來決定（Alt and Crystal, 1983：152）。從選民的理性角度出發，假定了選民有能力來瞭解客觀經濟情況，並預測之。

至於以選民的情感層面來解釋經濟投票，Conover 和 Feldman（1986）利用幾項情緒性的詞彙來測量選民對經濟情況的反應，包括正面的形容：希望、自豪、快樂、同情、自信，與負面的形容：生氣、害怕、厭惡、挫折、擔心，詢問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的感覺為何。研究結果則是顯示情感層面的評估對於選民的影響要大於認知層面的評估。Lewis-Beck（1988：41-42）在歐洲的大規模訪問中，也提問受訪者是否對於執政黨在處理經濟上感到生氣。不過由於資料上的受限，並沒有類似詢問選民情感的問題，因此無法處理選民在經濟投票的情感層面。

以上的文獻回顧，探討了經濟投票的理論與研究方向，我們可以知道選民評估的對象包括自身的經濟狀況與國家整體的經濟狀況，而評估的方向包括回顧型與前瞻型評估，以及選民是否以理性的態度看待經濟狀況。然而，在後續的研究中，卻也發現選民對經濟情況的評估並不直接地影響其投票行為，而是在經濟評估的背後存在著異質性因素。

二、同質性或異質性？

學界在八〇年代興起一股研究經濟因素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熱潮，然而在九〇年代迄今，對於選民經濟投票浮現了不同的解釋，學者們認為經濟情況與投票抉擇之間並不存在著直接的關連性，就經濟投票的本質而言，存在著異質性的性質，如美國中心價值、集體主義、媒體的使用（Gomez and Wilson, 2001：901）。換言之，選民不再單純地就經濟情況的好壞來決定是否支持執政黨，而是在評估經濟情況的同時，存在著其他歸因因素（attribution），因此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不再是同質性的，而轉變為異質性。例如 Duch（2001）針對後共波蘭與匈牙利國家選舉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傳統的經濟投票理論，在這些民主轉型國家並不適用。作者從政治知識與政治信任感來解釋經濟

投票，並假設當民衆的政治知識愈高，愈能去接受各式各樣的訊息，愈能瞭解政治過程，因此更清楚政府政策與經濟結果之間的連結，而產生經濟投票。其次，對於政治信任感，作者假設政治信任感的高低是影響選民的決定性因素。當選民對政府有較高的政治信任感時，對公職人員、政府效能與決策正確性有較高的信任，因此，便有能力根據政府的經濟表現來決定支持與否。作者的結論是在後共轉型國家當中，由於普遍存在著低政治知識與低政治信任感的選民，因而經濟投票的情況不夠彰顯。

從異質性來探討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爲，最常被學者們拿來解釋的變數便是選民吸收資訊的多寡。Carmines 與 Stimson (1980: 80-83) 認爲議題取向投票，可以根據議題的性質區分成兩種，分別是簡單議題 (easy issues) 與困難議題 (hard issues)。兩者差異便在「資訊成本」的多寡，簡單地說，困難議題使得選民必須投入較多的資訊成本來瞭解議題、政黨與候選人的立場；簡單議題則選民往往透過符號，不必涉及太多認知即可做出政治判斷。

Holbrook 與 Garand (1996: 351-372) 主張，選民如果對於國家經濟情況沒有精確的認識，便無法對經濟表現做出精確的評估，進而影響到投票抉擇。Holbrook 與 Garand 不但提到選民所擁有的政治知識會影響經濟情況之評估，更重要的假設在選民所擁有的資訊是否正確。根據作者的發現，多數選民在被詢問到目前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爲多少時，兩者的平均值皆要高於實際值，同時以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爲應變數所建立的迴歸模型結果中，則是女性較男性更缺乏對國家經濟事務的正確認知，黑人較白人缺乏對經濟事務的正確認知 (註二)，而個人經濟情況回顧評估只在失業率的模型中顯著，在通貨膨脹率的模型中並不顯著，作者提出的解釋是個人對於失業率變動要較通貨膨脹率變動來得敏感 (註三)。總結作者所提出的討論，因爲對經濟情況的錯誤認知，包括過度高估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進而認爲整個社會經濟情況變差，因而影響投票抉擇。

Duch, Palmer 與 Anderson (2000: 635-643) 研究指出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的評估會有系統地隨資訊、政治態度、個人財務經驗與選民本身的社經特質影響而改變。同時，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亦會受到偏差影響，對解釋的變項產生影響。也因此資訊、政治態度、個人經驗、社經特質這四項主觀性的考量，會影響到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的評估。模型結果也驗證作者所提出的假設，即選民對於國家經濟情況的評估並非完全客觀。可見選民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來瞭解政治事務，是研究經濟投票行爲的一項問題，對於所接收到的資訊是否客觀，也會影響到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

總而言之，80年代之後，學者對經濟投票的解釋不再侷限在經濟因素與投票抉擇之間的直線關係，相對地，選民經濟評估的背後尚隱藏著若干因素，影響其投票決定，這

些因素可能是選民本身的特質，如職業、教育程度或是政治制度的影響，如後共國家選民的政治知識與政治信任感等。因此，針對台灣進行經濟投票之研究，或許可以找出類似的因素。

參、研究資料與方法

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不僅是單純的經濟評估影響著選民投票抉擇。相對地，隨著不同的政經環境與發展，會有不同的異質性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依循此理論脈絡，筆者試圖去建構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模型。以下，將分別說明本文所要採用的變數、統計方法，以及使用的資料來源。

一、選民的經濟評估

在本研究中，自變數為選民的經濟評估。選民的經濟評估可分為個體與整體兩方面，對於個人經濟評估包含下述兩道題目：

請問你覺得你家裡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或是差不多？

請問你覺得你家裡在未來一年的經濟狀況會變好、還是變不好，或是差不多？
對於國家整體經濟評估，則包含下述兩道題目：

請問你覺得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或是差不多？

請問你覺得台灣未來的一年經濟狀況會變好、還是變不好，或是差不多？

根據理論所述，選民對經濟評估可分為前瞻型與回顧型，因此在本研究的測量當中，也包含著這兩個概念。對於經濟評估變數的編碼是將回答比較好者，編碼為2，差不多，編碼為1，比較不好者，編碼為0，受訪者在此項目反應視為順序尺度（註四）。至於無反應選項，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則歸為差不多（註五）。

二、選民基本背景、統獨議題、政黨認同

除了選民的經濟評估外，本研究亦加入其他變數，包括選民基本背景、政黨認同、統獨議題等變數，以檢證在加入其他變數的作用後，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以下將分別說明控制變數的處理方式。

在選民的社會背景上，筆者將以職業、教育程度變數來處理。在職業的分析中，不同的職業對於經濟情況的評估可能有所差異，不同部門職業的選民，例如白領階級或是

勞工，對於經濟評估可能與失業的選民有所差異。有職業的選民也許考量的是個人的投資、薪資的升漲，無業的選民包括已經退休或是失業者，也許考量的是銀行利率漲跌、再度就業的問題。這些考量都與經濟狀況息息相關，因此本文預期不同職業的選民，在經濟評估考量上有所差異，並影響到本身的投票抉擇。

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政治態度，透過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使得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在吸收媒體資訊，對事務的評價判斷都會有所差異。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對於經濟事務會有較高的通曉程度，在評估經濟情況時也許較能夠明瞭現今台灣經濟情況的變遷。但是，低教育程度的選民，對於經濟狀況波動的感受，受到收入與社經地位的影響，有時要較高教育程度者來得敏感（註六）。因此，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考量的客體不同，在經濟評估上亦會有所差異，並影響到投票抉擇。因此，本文將加入選民教育程度，透過教育程度上的差異來驗證，經濟評估是否對投票抉擇產生影響。

顯然地，在某種程度上，統獨議題發揮相當之影響力，尤其統獨本身所引起的國家認同、省籍情結，以及國家安全等問題。統獨議題類似美國的種族議題，為一個簡單議題，由於政治人物的作為，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互動、媒體的報導，以及省籍對立與族群衝突的經驗，使得台灣民衆不需要負擔太多資訊成本，也不需要太多認知與概念技巧，即可將自己、主要政黨以及候選人擺在統獨光譜上（盛杏媛，2001：4）。因此，本文將控制統獨議題來探討經濟評估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在變數處理上，本文擬採虛擬變數的方式，將受訪者回答合併為支持統一、支持獨立、維持現狀。

關於政黨認同的測量，一直有著極大的爭議，最主要的討論即是在超過兩黨的競爭下，原先單一空間的測量：支持民進黨-支持國民黨，即起了變化，包括加入了新黨、建國黨、親民黨與台灣團結聯盟，使得政黨認同成爲一個多面向的概念。關於政黨認同的測量方式，本文引用劉義周（1996：3-4）所談到的，「由於多黨制的情況下，政黨認同成了類別測量。類別變項在統計分析時，通常有處理上的困難。但是從原先問卷中測得的資訊，並不完全是類別資料。如果捨棄不用，也等於是浪費已有的資訊。基於這些考慮，又基於統計處理上的方便，我們打算把問得的資訊，轉換爲在單一面向上的測量」。因此本文對於政黨認同的處理，視爲單一面向，也就是當他認同國民黨時，表示不支持其他政黨的意涵。在資料的處理過程中，將受訪者的回答歸類爲支持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親民黨與中立無反應者。在續問題目中，受訪者有回答政黨傾向者，同樣歸類爲支持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親民黨與中立無反應者。

三、模型建構

筆者將利用多元洛基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來處理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

抉擇之間的關係。利用多元洛基模型來處理，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使得二類別以上的應變數，在同一個迴歸模型中比較，與二元洛基模型（binary logit model）的差異，在於本文的應變數要處理兩個以上的政黨，而多元洛基模型可以充分地運用資訊來做精確的估計。因此，在立委選舉中比較出在野黨與執政黨在同一個迴歸模型中，自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

在本文應變數的分析上，是以選民的投票對象為主，而以政黨作為分類的基礎。在分析對象上，僅分析主要政黨，一方面投給其餘政黨的樣本數並不多，例如新黨、台聯黨，如果放入新黨對抗民進黨的模型，便是多增加估計值，而增加操作上的限制（Aldrich and Nelson, 1984: 73），（註七）另一方面樣本數過少，經過與應變數的交叉切割，便易出現因為格子內的樣本數為0的情況，而發生 micronumerosity 問題，在估計上便易產生估計值極大或極小的情況（陳陸輝，1998: 149）。

關於模型係數值詮釋方式，盛杏媛（1998: 48）提到由於洛基模型是非線性的模型，在詮釋估計值的方式也就與線性迴歸模型不同，在一般線性迴歸模型中，對於某一迴歸係數的詮釋是當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此一自變數對於應變數會有多少單位的變化，因此可以說明此一自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大小。但在洛基模型中，自變數對應變數的影響，則要視其他變數是控制在哪個水準上而定，並說明其相對的應變數機率是多少，藉此來評估自變數對於應變數的影響。

在模型變數的選擇上，包括經濟表現（包括個人家庭經濟評估與國家整體經濟評估）、經濟展望（包括個人家庭經濟評估與國家整體經濟評估）、教育程度、職業、統獨立場、政黨認同。其中，經濟變數的處理為比較不好、差不多、比較好，則依序給0分至2分，因此當選民認為經濟表現愈好，則會傾向支持執政黨，表現愈差，則會傾向支持在野黨。教育程度的處理分為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專科、大學及以上，依序為1至5。經濟變數與教育程度皆視為順序變數，具有連續性質。至於職業、統獨立場、政黨認同則被處理為虛擬變數，職業則分為無業與有業，統獨立場則分為支持台灣獨立、兩岸統一與維持現狀三類，本文也預期選民的統獨立場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當選民愈傾向某一立場，便會較支持贊成該立場的候選人。政黨認同則分為認同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以及無政黨傾向。同樣地，本文也預期選民的政黨認同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決定，當選民愈傾向支持某一政黨，便會較支持該黨候選人。

因此本文建構的模型如下：

$$\begin{aligned} \text{選民投票抉擇} &: \alpha + \beta_1(\text{國家經濟表現}) + \beta_2(\text{國家經濟展望}) \\ &+ \beta_3(\text{個人經濟表現}) + \beta_4(\text{個人經濟展望})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 + \beta_5(\text{教育程度}) + \beta_6(\text{職業}) + \beta_7(\text{台灣獨立}) + \beta_8(\text{兩岸統一}) \\ & + \beta_9(\text{認同國民黨}) + \beta_{10}(\text{認同民進黨}) + \beta_{11}(\text{認同親民黨}) \end{aligned}$$

四、資料來源

在資料來源部分，筆者將採用2001年由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政治大學三校聯合執行，黃紀教授所主持的「2001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研究計畫所釋出的資料。所有訪問的民衆，都是在台灣地區設有國籍、戶籍，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具有選舉權的公民為訪問母體，透過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的多階段抽樣（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各層獨立抽樣之原則，抽出樣本進行訪問。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以下，筆者將分析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當中，選民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在分析上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旨在探討選民針對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為何？第二部分則討論台灣選民投票行為是否存在著經濟投票異質性。

就表2所示，為選民針對國家整體與個人家庭經濟情況之評估與投票對象之間的交叉分析。是否具備經濟投票的特徵呢？筆者在此處的界定為當執政黨的得票比例隨選民的經濟評估好轉（由壞→一樣→好），而呈現遞增的情形，並且超過執政黨的「總計」得票率（註八）。當在野黨的得票比例隨選民的經濟評估好轉（由壞→一樣→好），而呈現遞減的情形，並且低於在野黨的「總計」得票率，則認定具有經濟投票行為的特徵。也就是當選民認為過去/未來經濟變好時，會較傾向支持執政黨，當選民認為過去/未來經濟變差時，會較傾向支持在野黨。表2交叉分析的結果中，就統計值而言，可以看出不論選民的經濟評估對象為國家整體或是個人家庭，皆與投票對象之間有顯著的差異存在。換言之，當選民認為過去經濟情況變差，會較傾向支持在野黨，如國民黨、親民黨，當選民認為過去經濟情況變得較好，則傾向支持執政的民進黨。同時這種趨勢在前瞻型的經濟評估中更加明顯，當選民評估未來經濟情況會變差時，國民黨的得票比例要高於民進黨，選民評估未來經濟情況將會變好時，民進黨的得票比例要高於國民黨。選民投票對象的差異，隨著選民對經濟情況評估的不同，而得以彰顯，因此筆者認為在2001年的立委選舉中，選民的投票行為具有經濟投票特徵。

為何在2001年立委選舉出現經濟投票的趨勢，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思考之，第一是台灣經濟成長的速度在近年來減緩，尤其自民進黨執政之後，民衆可以很明

顯地感受到景氣波動對生活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就業機會減少、行庫活儲利率降低等，因此經濟議題成爲選民關注的議題之一。其次，此次選舉是民進黨在贏得總統大選之後，第一次面對的全國性選舉，與過去選舉相異在於民進黨並未享有長期執政的優勢，選民對其執政能力與表現仍有所保留，對於民進黨在2000年總統選舉後的施政表現，格外引人注目，包括衰退的經濟表現，因此選民對於經濟狀況之評估，便會影響其投票選擇。

表2顯示選民的經濟評估，在不同的投票對象上有明顯的差異，筆者進一步利用多元洛基模型來檢證在加入其他變數之後，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的關係如何，結果如表3所示，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並不顯著，不論是國家經濟表現、展望，或是個人經濟表現、展望。對此結果，筆者認爲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解釋之。第一，在台灣選民的投票評估中，經濟評估的確並非影響其投票決定的主要變數，包括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才是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變數。其次，近來經濟議題之所以受到重視與台灣經濟環境的惡化有關，雖然如此，但在這幾次選舉中仍未發揮一定的影響力，筆者認爲受到選舉時政黨對議題的操作，統獨、省籍情結發酵，以及候選人的特質影響所致，因此造成在表3的統計模型中，選民的經濟評估對其投票決定的影響並不顯著。最後，可能是在全體受訪者中，有其他歸責因素影響著經濟評估，從國外近來對經濟投票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選民經濟投票異質性的存在。因此接下來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即是歸因理論與異質性對經濟投票之影響。

表2 經濟評估與投票對象之交叉列表

類型	方向	程度	親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無黨籍及其他		合計		統計值
			次數	橫%	次數	橫%	次數	橫%	次數	橫%	次數	橫%	
總計			212	16.5	337	26.2	489	38.0	248	19.3	1286	100.0	
國家整體經濟評估	回顧經濟	壞	159	18.2	267	30.5	286	32.7	163	18.6	875	100.0	$\chi^2=52.07$
		一樣	40	12.9	58	18.7	146	47.1	66	21.3	310	100.0	df=6
		好	11	12.1	9	9.9	54	59.3	17	18.7	91	100.0	$p < 0.05$
	前瞻經濟	壞	51	21.3	87	36.3	55	22.9	47	19.6	240	100.0	$\chi^2=59.88$
		一樣	105	17.7	159	26.8	215	36.3	114	19.2	593	100.0	df=6
		好	42	12.2	55	15.9	172	49.9	76	22.0	345	100.0	$p < 0.05$
個人家庭經濟評估	回顧經濟	壞	105	17.2	187	30.6	214	35.0	106	17.3	612	100.0	$\chi^2=18.45$
		一樣	97	15.6	146	23.5	248	40.0	129	20.8	620	100.0	df=6
		好	8	15.7	5	9.8	25	49.0	13	25.5	51	100.0	$p < 0.05$
	前瞻經濟	壞	42	17.9	76	32.5	68	29.1	48	20.5	234	100.0	$\chi^2=22.97$
		一樣	130	17.2	202	26.6	278	36.7	148	19.5	758	100.0	df=6
		好	27	13.4	34	16.9	97	48.3	43	21.4	111	100.0	$p < 0.05$

表3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元洛基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I

自變數	親民黨相對民進黨			國民黨相對民進黨		
	係數	標準差	Exp (B)	係數	標準差	Exp (B)
國家經濟表現	0.21	0.20	1.23	-0.22	0.18	0.80
國家經濟展望	-0.19	0.20	0.83	-0.26	0.17	0.77
個人經濟表現	-0.25	0.24	0.78	-0.47	0.20*	0.62
個人經濟展望	-0.16	0.22	0.85	-0.24	0.19	0.79
教育程度	0.14	0.10	1.15	0.23	0.09**	1.25
職業 (有職業=0)						
無業	-0.16	0.27	0.85	0.21	0.22	1.23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0)						
台灣獨立	0.01	0.37	1.01	-0.03	0.29	0.97
兩岸統一	0.49	0.27 ^{\$}	1.63	0.48	0.25*	1.62
政黨認同 (無支持政黨=0)						
國民黨	1.22	0.39***	3.40	1.73	0.33***	5.65
民進黨	-2.35	0.34***	0.10	-2.28	0.25***	0.10
親民黨	2.27	0.37***	9.70	0.45	0.37	1.56
常數項	-0.61	0.37 ^{\$}		0.29	0.31	

N=860 LR $\chi^2=543.10^{***}$ Pseudo $R^2=0.302$ 正確預測率=70.1%

說明：\$: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關於歸因理論與經濟投票異質性，筆者在文獻回顧中也曾提到，如 Gomez 和 Wilson (2001) 的討論，自1990年代迄今，對於經濟投票有了不同的解釋，學者認為經濟情況與投票抉擇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關連性，對於經濟投票的本質而言，則是存在著異質性。選民不再單純地就經濟情況的好壞來決定是否支持執政黨，而是在評估經濟情況的同時，存在著其他歸因因素 (attribution)，包括利用政治信任感、政治知識或是經濟評估的正確性與否來探討，因此當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不再是同質性而轉變為異質性的同時，對於原來的經濟投票模型便有改進的空間。因此，從 Gomez 和 Wilson (2001) 針對歸因理論的探討，可得到 (1) 在因果歸因的認知過程中，影響責任歸因的因素為訊息 (information)，但是訊息通常是透過個人傾向的過濾產生，因此荷包投票的可能性會隨著個人傾向，而產生系統性變化。(2) 不同政治練達層次的個人會有不同的能力做出判斷。低政治練達的民衆，通常缺乏連結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能力，因此會傾向將個人經濟責任歸因至最能與民衆荷包連結的因素；反之，在高政治練達的民衆中，具備連結經濟情況判斷與政治因素的能力。綜合言之，兩種不同性質的民衆在能力上的差異，進而在投票考量上，所考量的因素也有所不同。因此，以歸因理論來解釋選民經濟投票行為，必須回溯到歸因因素是如何形成？而此歸因因素是否確實影響之後的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

關於歸因理論，在2001年的問卷中訪問受訪者「如認為過去台灣的經濟情況變差，則台灣經濟變差，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調查結果如表4所示。有17.9%的民衆將經濟表現不好的原因歸咎為國際環境所致。其次才是總統 (13.5%) 與執政的民進黨 (12.4%)。本研究針對歸因的探討，目前考量層次乃是以歸責對象作為區隔，因此將經濟變差的責任歸責至國際、國外因素之選民剔除，投票模型僅以將經濟變差歸責至國內因素的選民來分析。由於民進黨執政後，國內經濟環境明顯地變差，國內景氣明顯地受到政治上不穩定因素的影響，以及國內產業結構上的問題，不單只是國際因素之影響所致。此外，在經濟投票理論中，選民最主要評估對象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經濟表現，而其經濟表現好壞應由執政黨負責任，而非國際因素來模糊經濟投票的焦點，畢竟選民在選舉中投下的那一票，相當程度是奠基在該政黨過去的表现，或是相信政黨提出的政見承諾。因此在歸因的邏輯上 (訊息→歸因→評估)，能夠確切感受台灣經濟之困境，筆者認為在經濟評估的判斷上，便能更客觀地彰顯出民衆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

表4 台灣經濟情況變壞，你認為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類別	次數	%
國際因素	252	17.9
總統	189	13.5
執政之民進黨	174	12.4
立法院	109	7.8
行政院	76	5.4
人民	74	5.3
企業家	72	5.1
在野黨	67	4.8
都有	52	3.7
其他	105	7.5
無反應	233	16.6
總和	1404	100.00

說明：

- 1.其他包括“不知道”或回答百分比在2.0%以下的類別。
- 2.各類別百分比比例都已經過筆者的合併，包括中共（0.3%）合併入國際因素，勞工（0.4%）則合併入其他。

利用歸因理論，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將回答國際因素與無反應的選民過濾掉，僅以歸責對象為國內因素的選民作為分析對象。由於問卷上的限制，此次訪問中僅追問受訪者「關於台灣經濟情況變差，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在個人經濟情況評估部分，問卷中並沒有續問「誰應該負責任」，因此在變數選擇上，筆者僅保留國家經濟評估（對過去表現、對未來的展望），重新檢視這些選民的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之影響如何。表5可以發現，國家經濟評估變數對投票抉擇的影響顯著，同時經濟評估對投票對象的影響力，亦符合本文之預期。在親民黨相對民進黨的模型中，選民的國家經濟展望與統獨立場中主張兩岸統一者，以及政黨認同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者，皆為顯著之變數。在國民黨相對民進黨的模型中，選民針對國家過去的經濟表現與未來的經濟展望評估，以及政黨認同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者皆為顯著之變數。因此，在2001年立委選舉，透過多元洛基模型，當在摒除掉歸責對象為國際因素的選民之後，其他選民的經濟評估確實符合經濟投票理論假設，而影響其投票抉擇，包括國家經濟表現與展望的評估，同時國家經濟展望評估的影響力又要大於國家經濟表現評估。

表5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元洛基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II

自變數	親民黨相對民進黨			國民黨相對民進黨		
	係數	標準差	Exp (B)	係數	標準差	Exp (B)
國家經濟表現	0.02	0.21	1.02	-0.37	0.19*	0.69
國家經濟展望	-0.42	0.20*	0.66	-0.48	0.17**	0.62
教育程度	0.17	0.10	1.19	0.18	0.09	1.19
職業 (有職業 = 0)						
無業	-0.12	0.29	0.89	0.20	0.25	1.23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 = 0)						
台灣獨立	0.12	0.41	1.13	0.04	0.33	1.04
兩岸統一	0.57	0.30*	1.77	0.40	0.28	1.50
政黨認同 (無支持政黨 = 0)						
國民黨	1.06	0.44*	2.87	2.00	0.39***	7.40
民進黨	-2.59	0.38***	0.08	-2.14	0.29***	0.12
親民黨	1.97	0.38***	7.18	0.60	0.39	1.83
常數項	-0.47	0.38		0.18	0.34	
N = 720 LR chi2 = 477.00*** Pseudo R ² = 0.313 正確預測率 = 71.4%						

說明：*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從歸因理論可以檢視出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並非完全如表3的統計結果，經濟評估並未影響著投票抉擇，相反地透過歸因理論，可以發現部分選民的經濟評估是會影響投票抉擇。從上述討論，以歸因理論為基礎，筆者找出了一群確實具有經濟投票特徵的選民，然而，究竟是何種變數影響這群選民，以及他們的特質為何，接下來則將檢驗之。

Duch (2001 : 897) 談到政治信任感是反應選民對於政治行動者與政府體制的信任，能夠形成選民對於現任者或是政府體制的態度，並且防止尋租行為等自利行為產生。因此政治信任感高的民衆，便易採取認可支持的行動，而出現經濟投票；反之，政治信任感低的民衆，則不易出現經濟投票。在台灣，針對選民政治信任感所做的研究，如陳義彥 (1995 : 90-96) 分析1994年台灣省長選舉中選民的政治信任感，不過該研究中，是將「政治信任感」改為「對政府的信任感」，主要指涉人民對中央政府的官吏與作為是否有信心或給予支持的感覺。結果顯示，年齡越高，則政治信任感逐漸升高，教育程度越高，則負面的評價亦升高。而投給國民黨籍的選民，在「對政府的信任感」要較投給民進黨籍與新黨籍的選民要來得高，不過在量表上仍然是負面的評價。陳義彥、

陳陸輝（2002：12-20），根據1992年至2001年間四次調查資料，其中針對民衆政治信任感所做的分析，發現1992年至1998年民衆的政治信任感有下降的趨勢，但是在2001年政黨輪替之後則又有回升的現象。另外，針對影響民衆政治信任感的迴歸模型分析中，對於過去經濟情況的評價，亦是影響的變數之一。當民衆認為過去經濟變差了，政治信任感也隨之減少，在四次調查資料的分析中，皆呈現相同的趨勢。由此可知，經濟評價與政治信任感之間存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以下將根據政治信任感與經濟評估之間的關係，來檢視台灣選民經濟投票的異質性行爲。

本文將比較選民的異質性對於經濟事務的評估，是否會影響到選民的投票抉擇。換言之，高政治信任感的選民是否會較低政治信任感的選民更有經濟投票的傾向出現。特別當民主逐漸鞏固，選民對政府體制與人事運作的信賴，隨著政黨輪替的出現，是否產生改變，而在經濟評估上有所差異。關於政治信任感的處理，在2001年的立委調查資料中，共有6道題目來測量選民的政治信任感，筆者將受訪者的回答重新歸碼並分類，高於平均值者編為信任感高的一方，反之則編為信任感低的一方。因此，將政治信任感以虛擬變數處理之，並與民衆針對國家經濟情況之評估交互作用，檢驗政治信任感是否為選民經濟投票的異質性因素。結果如表6所呈現，政治信任感與國家經濟情況之間並不存有交互作用。換言之，經濟評估對投票抉擇的影響並不受政治信任感的影響。透過上述討論，可以得知台灣選民經濟投票行爲存有異質性，但是受何種變數影響所致，則仍有待後續研究探討之。

表6 選民投票抉擇之多元洛基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III

自變數	親民黨相對民進黨			國民黨相對民進黨		
	係數	標準差	Exp (B)	係數	標準差	Exp (B)
國家經濟表現	0.31	0.64	1.37	-0.95	0.61	0.39
國家經濟展望	-0.53	0.57	0.59	-0.32	0.51	0.73
教育程度	0.16	0.10	1.17	0.17	0.09	1.18
職業 (有職業 = 0)						
無業	-0.11	0.29	0.89	0.21	0.25	1.24
統獨立場 (維持現狀 = 0)						
台灣獨立	0.11	0.41	1.12	0.05	0.33	1.05
兩岸統一	0.57	0.30	1.77	0.42	0.28	1.52
政黨認同 (無支持政黨 = 0)						
國民黨	1.10	0.45**	2.99	2.04	0.39***	7.66
民進黨	-2.49	0.39***	0.08	-2.11	0.30***	0.12
親民黨	1.99	0.39***	7.29	0.58	0.39	1.78
政治信任感 (低 = 0)	-0.50	0.38	0.61	-0.33	0.33	0.72
國家經濟表現 × 政治信任感	-0.13	0.32	0.88	0.32	0.29	1.37
國家經濟展望 × 政治信任感	0.11	0.29	1.12	-0.05	0.25	0.95
常數項	0.31	0.73		0.67	0.65	
N = 720 LR chi2 = 483.94*** Pseudo R ² = 0.318 正確預測率 = 71.9%						

說明：*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伍、結論

本文探討2001年立委選舉中，台灣選民是否存在著經濟投票行爲。當不考慮其他因素，僅以選民的經濟評估與投票對象的關係來探討，透過交叉分析與筆者自行界定的經濟投票標準，我們可以發現選民具有經濟投票的特質。然而，當我們利用多元洛基模型，在加入其他變數的作用下，選民如果同時考量國家整體與個人家庭的經濟評估，則經濟評估對投票對象的影響並不顯著。透過歸因理論，本文將那些認為經濟不好的理由應該歸因至國際因素的選民剔除，進而分析將國家經濟不好歸責至非國際因素的選民，其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之間的關係，發現模型得出的結果符合經濟投票的理論。同時，筆者試圖進一步以政治信任感作為影響選民經濟評估的異質性變數，但從模型結果可得知，政治信任感並非影響選民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關係的異質性變數。

雖然，本文試圖以政治信任感來解釋經濟評估與投票對象之間的關係，但統計分析

的結果並不支持兩者之間的關係受政治信任感影響。因此，何種變數影響著選民的經濟評估，進而影響投票抉擇，仍有待討論。此外，選民對於經濟情況之評估正確與否，則是另一個值得商榷的議題。表2至表4乃是針對選民經濟投票行為所做的一連串探討。從最初的表2，經濟評估與投票對象的交叉分析，到表3的多元洛基模型的統計分析。經濟評估對投票對象的影響，在加入其他變數之後，變得不顯著。這意謂著經濟評估並非選民投票抉擇的考量之一，也可能是經濟評估本身的變數出現問題，受到問卷的限制，筆者無法檢驗受訪者對當今經濟情況是否有正確的認識，並進一步做出評估。最後則是歸因理論的運用，從調查中可以發現民衆對於台灣經濟情況變差，有各自不同的歸責對象。在本文是以國內與國際因素作為分際的界線，區分原因如前所述。不過，選民是以何種心態來歸責，為什麼選民會歸責至國際或是執政黨，是在何種基礎上做出判斷？此心理層面的探討，便需要更深一層問卷設計與研究，才能確切瞭解經濟投票行為。

因此，透過前面的研究，本文歸納出幾項結論，第一，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存在著異質性，而該異質性透過歸因理論，將經濟不好歸責至國際因素的選民，正是影響台灣選民經濟投票顯著與否的關鍵。第二，雖然政黨認同影響著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但是透過歸因理論的考量，我們仍可以看出隨著經濟評估的變化，選民仍具有經濟投票的特質。第三，對於經濟投票的研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值得進一步探討，包括選民經濟評估的正確與否、歸責對象的探討、何種因素影響選民的歸責。因此，在研究台灣選民的經濟投票行為時，筆者認為並非單純的經濟評估與投票抉擇兩者間簡單直線關係，可以做出最後結論。相反地，如何探討出選民經濟評估背後心理因素，乃是研究經濟投票的關鍵所在。

* * *

投稿日期：92.01.21，修改日期：92.10.24，接受日期：92.12.26。

註 釋

- 註 一：2001.11.09 中時電子報，「反失業，連戰將帶頭遊行」。2001.11.14中時電子報，「救經濟，李登輝端出『牛肉全餐』」。
- 註 二：作者無法對此結果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其他研究中談到，女性要較男性更瞭解國家經濟事務的認知，例如 Welch 和 Hibbing (1992)。因此，作者只能歸咎於該研究僅是一初探性的研究，需要後人對性別在經濟事務的評估上做更深入的討論 (Holbrook and Garand, 1996: 370)。
- 註 三：對於經濟變數在失業率的模型顯著，在通貨膨脹模型中多呈現不顯著的情況，作者提出的解釋是因為人們較容易感受到失業率的變動，而非通貨膨脹率的變動，同時媒體對於經濟情況的報導，多半集中在負面的失業率，例如就業情況，而對於正面就業機會與通貨膨脹升降（如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導的頻率，不若負面就業情況 (Holbrook and Garand, 1996: 365-370)。
- 註 四：當然這是一項大膽的假設，究竟選民對評估經濟情況的態度量表，究竟應算是類別資料，還是順序資料，是社會科學研究常會遇到的問題。
- 註 五：關於無反應選項之所以納入分析的範圍，主要是為了統計分析的方便：增加樣本數，筆者假設對於經濟情況的評估，受訪者的回答歸類至無反應者，認為經濟情況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差不多，只是在反應上未表態而已，因此合併至「差不多」的類別中。
- 註 六：在 Who votes?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一書中對於選民的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社經變項與投票率之間的關連性做過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受到教育過程中觀念的灌輸、政治學習的影響，教育程度愈高愈會去投票。收入較佳的人，由於選舉會影響財富，所以會較關心選舉與結果。職業地位較高者，投票率愈高。在三個變數的比較上，教育程度對投票率的影響最大。不過，資料中並無法證實社會地位與收入高的民衆，會有較多的空閒時間與充裕的經濟狀況來從事投票，因此有較高的投票率。
- 註 七：多元洛基模型中的估計值，當自變數有 k 個，應變數共有 j 個類別時，會產生 $k(j-1)$ 個估計值。
- 註 八：此處各政黨「得票率」總計乃是剔除其他無反應（投廢票、未投票）選項後，受訪者投票對象的比例分配。

參考書目

I. 中文部分：

林慧萍

- 1995 「探討台灣選民的議題取向投票－民國八十二年縣市長選舉分析」，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徐火炎

- 1991 「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五卷一期：213-263。

盛杏媛

- 1998 「選民的投票決定與選舉預測」，*選舉研究*，五卷一期：37-75。
2001 「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一九九〇年代的分析」，新政局的開端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陳陸輝

- 1998 「1996年總統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五卷一期：139-160。

陳義彥

- 1995 『選民對政府的信任感』，「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從八十三年省市長選舉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頁90-96。

陳義彥、陳陸輝

- 2002 「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台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1選舉與民主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黃秀端

- 1994 「經濟投票與選民投票抉擇」，*東吳政治學報*，三期：97-123。
1996 「候選人因素與總統選舉」，選舉制度、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黃德福

- 1994 「政黨競爭與政治民主化：台灣地區政黨體系的新挑戰」，*選舉研究*，一卷二期：199-220。

劉義周

- 1996 「世代、統獨立場與投票抉擇」，選舉制度、選舉行爲與台灣地區政治民主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與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謝復生

- 2000 「理性抉擇理論的回顧與前瞻」，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何思因、吳玉山編，政治學報特輯，31：141-153。

II . 英文部分：

Aldrich, John H., and Forrest D. Nelson

- 1984 *Linear Probability,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Beverly Hills: Sage.

Alt, James, and Alec Crystal

- 1983 *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 1980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78-91.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and Stanley Feldman

- 1986 "Emotional Reactions to the Economy: I'm Mad as Hell and I'm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1): 50-78.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Stanley Feldman, and Kathleen Knight

- 1987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Economic Foreca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3): 559-583.

Downs, Anthony

- 1957 *A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Duch, Raymond M.

- 2001 "A Development Model of Heterogeneous Economic Voting in New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4): 895-910.

Duch, Raymond M., Harvey D. Palmer, and Christopher J. Anderson

- 2000 "Heterogeneity in Perceptions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d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4): 635-652.

Fiorina, Morris P.

-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omez Brad T., and J. Matthew Wilson

- 2001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Voting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 Theory of Heterogeneous Attrib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4): 899-914.

Holbrook, Thomas, and James C. Garand

- 1996 "Homo Eonomus?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Voting."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9(June): 351-375.

Kinder, Donald R., and D. Roderick Kiewiet

- 1981 "Sociotrop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Cas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129-161.

Lewis-Beck, Michael S.

-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iao, Tim Futing

- 1994 *Interpreting Probability Models: Logit, Probit, and Other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cKuen, Michael B., Robert S. Erikson, and James A. Stimson

- 1992 "Peasants or Bankers?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nd the U. S.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 597-611.

Welch Susean, Hibbing John

- 1992 "Financial Conditions, Gender, and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1): 197-213.

Wolfinger, Raymond E. and Steven J. Rosenstone

-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Evaluation of Economic Voting and Voting Choice: 2001 Legislative Election of Taiwan

Bo-yauo 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whether the evaluation of economic condition in electorate influences the voting choice. The election in Taiwan, with the bad economic condition, do the economic voting exist? When the electorate evaluate that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bad, will they punish the ruling party by their votes? We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valuation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voting choices, attributive theory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voting.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is article, 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and national evaluation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voting choices. In the multinomial voting model,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that affects the voting choices is not the main factor. Therefore, by using attributive theory and sample choosing, I find some electorate who has the economic voting character. But in the testing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vot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evaluation don't exist the interaction. The effect of economic evaluation to the voting decision doesn't be affected by political trust. We can know that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economic voting of Taiwan electorate. However, what kind of variable causes the effect is the main continuous issue.

Keywords: economic voting, heterogeneity, attribution theory,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trust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